

红旗

HONGQI

一九六二年 13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二年第十三期 ★

目 录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 薄一波 (1)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黄范章 (11)

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虚伪性 张友渔 (20)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 向 阳 (28)

利害篇 关 锋 (32)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冯其庸 (34)

——文艺随笔

☆ 七月一日出版 ☆



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

薄 一 波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国民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工业各部门，决不可能脱离农业这个基础，而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商品粮食、副食品和工业原料，能够提供多少劳动力，能够提供多少购买力，无论对于轻工业的发展或者重工业的发展，都起着首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以农业为基础，这是有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根本问题。一切隶属于全局的局部问题，只有在正确处理全局问题的条件下，才能够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指导工业建设必须具有这种全局观点。

正确地安排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并且正确地安排重工业和轻工业内部的各个行业、各个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以及如何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问题，作些探讨。

重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两个部门。在这两个部门发展的相互关系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又是以采掘工业的发展为基础的。采掘工业直接为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提供原料，并且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燃料。采掘工业所提供的原料、燃料愈多，冶炼、化学等工业就能够愈快地得到发展，从而机械工业和其他加工工业也就可以愈快地得到发展。反之，如果采掘工业发展得慢，加工工业的发展也就决不可能快。这是重工业发展过程中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采掘工业在现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曾经说过：“铁和煤是近代工业的大杠杆，我们无论怎样重视这种改良（按：这里是指采用先进技术）的意义，都不算过分。”^①

^①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83页。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谈到俄罗斯拥有丰富的铁矿石、矿物燃料、森林、水力、化学工业原料的资源以后，接着说到：“用最新技术来开采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基础。”^① 列宁并且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的总结，指出：“生产资料增长最快这个规律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就在于：机器劳动的代替手工劳动（一般指机器工业时代的技术进步）要求加紧发展煤、铁这种真正‘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② 这个结论，不仅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所证明，而且也已经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所证明。

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采掘工业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在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都把大力发展采掘工业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在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强调指出，必须增多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工业等采掘工业的生产，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于党和政府的重视，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采掘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在重工业内部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之间，也出现了新的不平衡。采掘工业特别是有色金属、煤炭、石油等工业的生产，在当前重工业生产中，成为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在采掘工业各个行业内的某些生产环节之间，也出现了不尽适应的情况。这种不平衡，有些是在大发展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有些是在具体工作中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而形成的。毛泽东同志早在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们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③

我们应当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已经取得的伟大成绩的基础上，在工业发展的新的水平上，求得重工业内部新的平衡。要做到这样，关键在于根据新的比例关系的要求，集中必要的力量，加强采掘工业，使采掘工业得到优先发展，使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关系进一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页。

② 《列宁全集》第1卷，第88页。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步地协调起来，使采掘工业内部的各生产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好地适应起来。

二

采掘工业必须得到优先发展，这是重工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由采掘工业的特点所决定的。要加强采掘工业，使采掘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掌握采掘工业的特点。

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比较起来有些什么不同的特点呢？

第一，加工工业的劳动对象，即生产所用的原料、材料，都是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成品，都是可以移动的；而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如马克思所说：“不是过去劳动的生产物，……都是自然不要报酬赐予的”^①，都是固定的，不能移动的。由于这样，采掘工业只能就那种固定的劳动对象，经常地移动机器设备和其他设施来进行生产，而不能像加工工业那样，可以有计划地调动劳动对象来进行生产。加工工业的工作场所，可以经常保持稳定；就一个加工工业企业来说，它的劳动手段经过不断更新，劳动力经过调整、补充，原料、材料经过有计划的供应，生产能力一般地是不会降低，而是不断增长的。而采掘工业则不同，它受矿产资源的分布、生成状态和储量的限制，在一个矿井、矿区内，矿产资源开采一点，就减少一点，开采完一个地区，就必须转移到另一个新的地区去开采，不然，即使有足够的设备和工人，也发挥不了作用，生产将发生中断。因此，要保持采掘工业生产的稳定性，就需要事先不断地准备好新的矿产资源和开辟出新的工作场所。

第二，加工工业一般地是在地上进行生产，而采掘工业一般地是在地下进行生产。采掘工业工人在地下作业，经常要同水、火、瓦斯、地层压力、煤尘、岩尘等不利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而且劳动比较繁重，体力消耗较大。一般地说，采掘工人的劳动条件不如加工工业工人的好。同时，采掘工业企业所占的劳动力又往往要比加工工业多得多。因此，在采掘工业企业里，尤其需要注意保证安全生产，巩固井下工人队伍，并且不断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减轻笨重体力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采掘工业的矿产资源一般是深藏在地下，要找到它，弄清它的储量、品位和生成状态，要弄清它的地质条件，要确定开采的方法和建设的规模，都要经过详细的勘探工作。而且由于许多矿产资源往往蕴藏在山区，要在这些地区建设采掘工业企业，常常还要兴修铁路、公路和电站。这种情况同建设加工工业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建设采掘工业企业比建设加工工业企业往往需要更多的投资，需要多用一两倍或者更长的时间，需要克服更多的困

^① 《资本论》第1卷，第757页。



难。而且采掘工业企业投入生产以后，达到設計生产能力的時間，比起加工工业企业要慢得多。

第四，加工工业企业，一般地只是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設，而采掘工业企业不但在扩大再生产的时候，需要进行基本建設，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过程中，也需要經常进行基本建設，如完成掘进（剝离）工程，而且这种工程量是很大的。

第五，加工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对于它的劳动对象來說，主要是物的形变和质变；而在采掘工业企业，主要是物体的采掘和轉移，而且是笨重物体的大量轉移，动辄有千百万吨。因此，运输在采掘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是一个基本的环节，它的地位比在加工工业企业中重要得多。脫离开搬运，采掘工业的生产过程就不可能完成。采出的矿石、煤炭如果不能搬运出来，生产就无法繼續进行，它的使用价值，也就不可能实现，加工工业企业也就得不到必要的原料、燃料。同时，采掘工业的生产，由于受自然资源的限制，在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是比較大的；社会生产对矿产原料、燃料的需要又是經常的、大量的，它們的运输量是很大的，在全国货运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发展采掘工业必須充分地考虑矿区内部的和矿区外部的运输条件，注意运输的經濟合理性。

采掘工业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的发展要比加工工业的发展受着更多的限制，需要更多的条件、資金和時間。我們在安排采掘工业生产和建設的时候，必須充分地注意到它的这些特点，既要考虑到需要，又必須考虑到自然资源、建設力量等方面的可能；既要考虑到当前的需要，又要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既要考虑到采掘工业本身的条件，又必須考虑到整个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

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在发展中必須保持互相适应的比例关系。由于采掘工业是加工工业的基础，而且加工工业本身的发展相对地比采掘工业容易一些，因此，在經過綜合平衡、保持正常比例的范圍內，应当加快采掘工业的发展，使采掘工业的生产能力更富裕一些，就是說，使它留有适当的余地，以便为加工工业的发展創造更为雄厚、可靠的物质基础。这样做，对于加工工业的发展，以至对于整个社会的生产都是有好处的，它可以提供充分的基本原料、燃料后备和儲备，而这是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和防备意外事故所完全必需的。正如馬克思曾經指出的：在資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廢止以后，社会再生产“一方面必須有一定量的固定資本，比直接需要的更多；另一方面，并且特別是原料等物品的儲存，也要比直接的常年的需要更大。（这一点，对于生活資料方面說，是尤其适合的。）这种过剩生产，等于是社会对它自己的再生产所需各种物质資料的控制器。”^①

① 《資本論》第2卷，第586頁。



三

那么，要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使采掘工业的发展适应整个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首先是在重工业内部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应当解决哪几个主要問題呢？

第一，保证采掘工业現有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得到补充。

采掘工业企业的生产过程，就其基本工序來說，是采矿、掘进（剝离）、搬运相結合的过程，也就是从生产准备到生产，又从生产到新的生产准备的反复循环和交錯进行的过程。

任何工业企业在进行生产之前，都需要作好生产准备工作。由于采掘工业的特点，掘进（剝离）是采掘工业特有的、主要的生产准备工作。掘进（剝离）不但为采矿創造条件，而且为搬运采出的矿石、煤炭創造条件。前面說过，采掘工业的劳动对象是固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工作場所經常移动，一个地区的資源开采完了，就必须轉移到另一个地区去开采。这就要求掘进（剝离）一定要走在采矿、搬运的前面，不断地提供采矿的接續工作場所和运输巷道。这种生产准备工作，对于保持采掘工业企业生产的不間断地进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固然，任何一种生产，当它失去劳动对象的时候，都无法維持。但是，就一个加工工业企业來說，当原料、材料和燃料不足的时候，还可以在企業之間相互調济使用，或者动用国家的儲备；当它的运输发生故障的时候，也比較容易解决。而采掘工业企业当矿产資源、工作場所接替不上，运输巷道阻塞的时候，便沒有調济或者周旋的余地，就只能中断生产。

在采掘工业企业中，采矿和搬运以掘进（剝离）为条件，掘进（剝离）服务于采矿和搬运。采矿、搬运和掘进（剝离）是統一在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之中的，但是它們之間又是矛盾的。由于这几个基本工序同在一个矿井（区）內进行，在時間的安排上，在人員、設備、材料的分配上，在运输巷道的利用上，往往互相有所牽扯。因此，需要根据它們在客观上存在着的一定的比例关系，来組織生产。如果違背相互的比例关系，只抓任何一个环节，必将造成采矿、搬运和掘进（剝离）不相适应，这对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在这个問題上，主要地应当防止只顾一时增加产量，把人力、設備过多地抽調到采矿方面来，而挤掉掘进（剝离）工作的偏向，那样做，虽然可能一时把产量突击上去，但是，掘进（剝离）量少了，准备开采的矿量不足，却將給以后的生产造成困难，使生产下降，甚至可能使資源受到破坏。因此，这种办法是不足取的。

为了保证生产持續地正常地进行，一切矿山都应当切实做好生产准备工作。拿一个煤矿來說，在采完这一段煤层（水平）的前几年，就要准备下一段煤层（水平）；在开采現有采区



的同时，就要准备下一个新采区；在开采现有工作面的同时，就要准备另一个新的工作面*。而这就需要加强包括矿井的开拓、延深在内的全部掘进工作，使采矿和掘进之間保持适当的比例。如果掘进量少，准备工作接續不上，就会影响当前生产的正常进行，甚至造成生产的中断；反过来，如果掘进量过多，势必过多地占用人力、設備和資金，也会影响当前生产的正常进行，而且需要維修的巷道过长，就将加大維修費用，提高成本，造成浪費。这两种情况，都是需要防止的。在当前主要的是防止前一种情况。

各个采掘工业企业，由于矿山的条件不同，受着地质条件、开采方法的限制，它們的采矿和掘进(剝离)之間的比例，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就同一个矿山来說，开发的初期和后期，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此，需要根据采掘工业企业的不同情况，确定采矿和掘进(剝离)的比例，而且需要經常地根据具体条件的变化进行平衡，当出現不平衡的时候，应当及时加以調整。

在矿山的采掘工作中，要根据大矿和小矿，貧矿和富矿，厚层矿和薄层矿，远矿区和近矿区，新矿区和老矿区，难开采的矿和容易开采的矿等等不同的情况，制定符合技术政策的合理的开采规划，以便最充分地利用自然资源。

第二，有计划、有步骤地增加采掘工业的新的生产能力。

发展采掘工业的生产，不仅要不断补充現有的生产能力，使目前的生产和下一步的生产結合得好，而且还要有计划地扩大新的生产能力，使近期的生产和远期的生产結合得好。由于矿山建設時間較长，特別是目前矿山的建設工作已經不能适应加工工业发展的要求，所以更需要加强矿山的建設。現在就要为若干年以后长远发展的需要，积极准备开发新的矿区，建設新的矿井。只有从长計議，根据国民經济发展的需要和采掘工业的特点，及早安排新矿区(井)的建設，才有可能不断地增加采掘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便于正确地处理采掘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内部关系，以及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如果計劃每年平均有一百万吨生产能力的新的大型煤矿矿井投入生产，或者有一百万吨开采能力的新的大型铁矿投入生产，那么，每年大体上要保持比这种計劃增加的生产能力大几倍的建設規模，才能使生产和建設互相适应起来。从这里不难看出，如果不“未雨綢繆”，而只想“临渴掘井”，是很难保证生产的正常发展的。

在矿区建設上，应当确定适当的規模。矿产資源状况是比較复杂的，儲量有多有少，矿

* 上下段煤层(水平)的接續，是以“开拓煤量”来表示的。“开拓煤量”，是指完成井筒、运输大巷、总回風道等基本工程以后，所得到的煤量。

新老采区和工作面的接續，是以“准备煤量”、“回采煤量”来表示的。“准备煤量”，是指完成采区的运输巷道和回風巷道以后，所得到的煤量；“回采煤量”，是指在采区内开出工作面，安装上开采設備后就可以生产的那一部分煤量。



床有大有小，矿层有深有淺，矿质有富有貧，在交通条件方面也各不相同。而且采掘工业的建設所需的資金、設備、材料較多，国家在一定时期用于矿山建設的物质技术条件又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在采掘工业企业的建設規模上，应当根据矿产资源的状况和当前人力、物力、財力的具体条件，作全面的經濟比較，按照經濟合理的原則，加以确定，該大就大，不該大的就搞中型或者小型的，不宜强求一律，或者主观地規定大、中、小型的比例。也不应当分散建設，把战綫拉得很长，而应当根据投資和材料、設備供应的可能性，選擇开发条件最好的矿区、矿井，分期分批地进行建設，以便充分地發揮投資效果。

在矿山建設过程中，应当严格注意保证工程质量，切实做到按期、按质地交付生产。那种“簡易投产”，降低工程质量，或者不适当地削減必要的單項工程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对于一部分沒有按規定的质量标准移交生产的矿山建設工程，应当根据可能的条件，首先使各項工程搭配成套。拿煤矿來說，应当有計劃地使提升、运输、排水、通風等生产系統，和井巷开拓等項工程，尽快地达到矿井的設計水平；同时，还应当有計劃地进行矿区范围的各項工程的填平补齐工作，使装卸、洗选、机修能力同原煤的生产能力相适应，以便充分地發揮矿井的生产能力。在有色金屬、黑色金屬矿山，同样应当注意解决类似的問題。在某些采掘工业企业，适应新增生产能力的需要，还应当相应地解决矿区外部铁路运输和电力供应等問題。在进行这些建設的时候，也都应当注意防止資金、物資的分散使用。

在新建、扩建、改建矿山的时候，还有一个問題需要解决：这就是，一个矿区资源的蘊藏量，究竟用多少年代把它采完最为合理，也就是說，一个矿区每年的生产能力定成多大、服务年限定为多长，才最为合理。一个矿区的矿产蘊藏量同开采能力之間是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的，这种比例关系，也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开发强度”。

对于采掘工业企业來說，怎样的开发强度才是最合理的呢？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以下的要求：（1）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矿产资源；（2）基本建設投資最低；（3）劳动生产率最高；（4）生产成本最低；（5）更好地为矿区附近的冶金、化工等企业服务，更好地适应国民經济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需要。几年来有些采掘工业企业，采用先进的、合理的开采方法，适当地提高了开发强度，取得了較好的經濟效果。但是，也有的采掘工业企业，超过了合理的开发强度，用多打井，多增設備，多添人的办法，来提高开采能力，并且采取錯誤的开采方法，只采厚层矿，不采薄层矿，只采品位高的矿，不采品位低的矿，这样做，虽然一时产量有所增加，但是，却降低了回采率，严重浪費了資源，过多地增加了投資，浪費了人力、物力，甚至造成生产下降，結果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社会主义的积累；而且有可能同附近的冶金、化工等加工工业企业的发展脫节，甚至使它所服务的加工工业企业，提前失去原料基地。显然，用这样的方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地达到多快好省的目的。因此，每个矿区都应当



远程运输来供应，既不利于生产，运输业也负担不了。凡是存在这种不合理状况的，必须逐步地改变过来，而且也能够改变过来。我国有丰富的遍布全国的矿产资源，根据统一的计划，完全可以逐步地按照社会主义生产分布的原则，合理地布置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建设。

为了逐步改变这种状况，一方面，以矿产品为原料、燃料的加工工业企业，特别是冶金、化工、火力电站等企业的建设，要力求接近原料、燃料产地，充分考虑原料、燃料的来源。例如，大型冶金工业企业，就应当靠近金属矿和煤矿来建设，至少要就一头：或者靠近煤矿，或者靠近金属矿。另一方面，在勘探建设采掘工业的地质资源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平衡，特别是要注意在目前缺少煤、铁并且有较好开发条件的地区，积极寻找可供建设新矿区的可靠的自然资源。应当在资源可靠和尽可能接近冶金、化工以及其他工业企业的原则下，有计划、有重点地建设一批矿山或矿井，以保证冶金、化工企业对于各种矿石的需要，以及工业交通部门和当地居民对于燃料的需要，并且为采掘工业同加工工业在长远发展中的更好适应，为运输力量的合理利用，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建设新的采掘工业企业的时候，需要注意不宜使布点过于分散。我国的冶炼、化工等企业主要是现代化的大、中型企业。如果它们的矿产原料、燃料基地分布在许多地方，那么，这种情况显然是同它们的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不相适应的。

第五，加强采掘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

采掘工业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特点所决定，耗费劳动量较大，劳动繁重程度较高。因此，无论是采矿，或者是掘进，以至新矿区、新矿井的建设，都要不断地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和机械化程度，以便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断地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要把现有的设备充分利用起来。矿山设备由于在地下同岩石作战，经常移动，并且受潮湿的侵蚀，容易损坏，因此，需要经常地做好设备的维修工作。要教育和训练工人，特别是新工人，经常维护设备；要严格地实行设备的使用、维护的责任制度和计划检修制度；要加强机修的能力，保证必要的检修材料和备品备件，提高检修质量，使设备经常处于良好的状态。

采掘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工作，应当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一般来说，地质条件较好的（储量多、矿体规则、品位高），应当先改造；地质条件差的（储量少、矿体复杂、品位低）后改造。在进行技术改造的时候，还要考虑到这个矿山外部的交通条件和水电供应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即使矿山内部技术改造好了，也不能充分发挥效益。就一个采掘工业企业来说，进行技术改造，应当先从加强生产上的薄弱环节着手，提高采矿和运输的机械化、半机械化水平。这样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用较少的投资、材料和设备，增产较多的矿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将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得到改善。



第六，提高采矿工人的思想觉悟和技术水平，巩固采掘工业的职工队伍。

加速发展采掘工业，必须有一支思想上有觉悟、技术上熟练的队伍。因为生产的条件，是需要人去创造的，技术装备，是需要人去掌握的。同样的生产条件，同样的设备，给政治觉悟高、技术熟练的人去运用，和给政治觉悟低、技术生疏的人去运用，生产的结果是大不一样的。

为了巩固采掘工人的队伍，充分发挥采掘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首先，应当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纪律性组织性教育，使采掘企业的每个职工都能够认识到采掘工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自己肩负的光荣责任，提高对工作的荣誉感、责任心；特别是对于青年工人，更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觉悟，使他们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安心于矿山的工作；同时，要在社会上对广大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更多的人认识到采掘工作岗位的光荣，使矿工受到社会的爱戴和尊重。其次，应当改善劳动条件。要建立和健全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规程制度，并且尽一切可能堵塞发生事故的漏洞，彻底消除生产中的隐患，创造安全生产的条件，减少职业病的发生，并且保证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的供应。再次，要作好生活资料的供应工作，逐步解决职工住宅不足的问题；同时，根据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原则，改进工资、奖励工作。此外，还要有计划地进行技术训练，使广大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青年工人逐步由技术的生手变为熟手。

在对于采掘工业企业的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技术训练的时候，应当充分发挥老工人的骨干作用、模范作用，因为绝大多数老工人无论在思想觉悟、组织性、纪律性方面，在技术熟练程度方面，都是青年工人应当学习的榜样。同时，应当充分动员技术人员的力量，来帮助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迅速提高技术水平，来不断改进企业的生产技术工作。

*

*

*

加速发展采掘工业，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就目前来说，有计划地加速采掘工业的发展，是贯彻执行党的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就长远来说，也是我国建立独立的完整的现代化国民经济体系的一个战略性步骤。采掘工业发展了，就可以促进整个重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就可以进一步地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首先是农业的技术改造，就可以用更多的生产资料支援农业生产，用更多的燃料支援农村和城市，并且将为轻工业、手工业提供它们所需要的设备和工具，特别是提供更多的重工业产品作为原料、材料，来增产日用工业品，节约农产品原料。这样，就可以进一步供应人民生活的需要，活跃市场。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特别是采掘工业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应当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为加速发展采掘工业而奋斗。



“人民资本主义”的反动本质

· 黄 范 章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在垄断资本家的带动下，掀起了一种硬把“人民”和“资本主义”这两个不相容的概念捏在一起的“人民资本主义”的叫嚣。一九五六年初，美国政府和美国广告协会还大张旗鼓地举办了专门的展览会，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曾亲临捧场。

“人民资本主义”的中心思想是：现代资本主义“变了”。它的鼓吹者，往往在假惺惺地责难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是“贪婪”、“剥削”、“非人道”的制度之后，便竭力宣扬美国资本主义已经或正在通过一个“划时代的革命”，变为一个“民主的”或“人民的”资本主义，说什么这个资本主义不仅与过去“毫无任何相似之处”，而且“远远胜过马克思所梦寐以求的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社会主义”。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说成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宣布美国已经“不用流血和革命而改革了资本主义”，企图以此来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

“人民资本主义”是为日趋没落的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一种谬论，其内容混杂，众说不一。在它的鼓吹者中间，有的说美国现在

已是“人民资本主义”了，有的则说正处在“过渡”阶段。他们捏造了种种所谓资本主义“革命”，但各人所侧重宣扬的“革命”内容又不尽相同。他们都强调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但有的人同时把所谓“国家调节”（尤其是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工会组织的作用也看作是“人民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有的人则说这些只是“过渡”阶段所需要的。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在美国的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的喧嚣中，比较突出的论调有“资本民主化论”、“经理制度论”、“收入革命论”这些说法。

所谓“资本民主化论”的鼓吹者宣扬，随着股份公司的普遍推行以及股票在居民中间的广泛推销，似乎在生产集中的过程中，竟相反地发生了资本分散的过程，企业的所有权竟从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转到了广大人民手中。例如，美国司密斯学院教授萨瓦多里在其著作《自由经济学》中说：“企业愈大，所有权就分散得愈广”。美国钢铁公司董事长布劳也煞有介事地说：“我们企业的所有权已发生了变革，……它们已为千万各式各样的人所占有”。美国布朗迪斯大学教授



馬·勒爾納更把这个情况吹嘘为“所有制革命”。他們企图制造“人民占有”企业的幻觉，来掩盖財政寡头对生产资料的独占。他們还引证了股份公司的所謂“民主制度”（如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民主”选举等等）来渲染这个幻觉。

此外，他們（如薩尔瓦多里等人）还把参加儲蓄、保險的工人和小生产者都說成是各种企业的“所有者”。理由是銀行、保險公司持有这些企业的股票或債券。

所謂“經理制度論”的鼓吹者宣揚，随着股份公司的发展，在壟断企业里发生了管理职能和資本所有权相“分离”的現象，即企业的管理全权已从資本家手中轉到了一个主要由董事、經理們組成的“新”的“經理階級”手中，并且說这是一次“經理革命”。他們抹煞企业的管理职能完全取决于資本所有权的事实，硬把它們割裂开来，把董事、經理們說成不仅是独立于整个資產階級之外的另一个“階級”（或“阶层”），而且是駕凌于它之上的“权力集团”。例如，美国的資本家兼政客、教授的阿道夫·貝利在其著作《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及《沒有財產的权力》中，就竭力宣揚这个“集团”“沒有財產”，但“拥有支配美国工业經濟的至高的、实际上无可抗衡的权力地位”；而股東們除了有权分紅外，其“权力地位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資本家“已經不是一个决定因素”。薩尔瓦多里吹嘘說，这个“經理階級”的出現，是“美国經濟革命的一个方面”。

“經理制度論”者都是壟断組織的忠实卫士，其辯护手法的特点是：承认統治美国經濟的权力集中在一小撮集团手里，但是，他們把这种集中不看成是資本主义制度的产物，而仅仅看作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并且竭力用謊言安撫人心說，掌握这个权力的是一个“嶄新”的“經理階級”，它不是財政寡头的代理人，而是“社会的代表”、“职工的代理人”；它不是靠財產而是靠管理企业的天才、組織才干等获得权力的；它主要关心的不是利潤而是“社会生产”、“人民福利”等等。他們企图借渲染“經理階級”的“权力地位”，来掩盖壟断資產階級对工人階級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剝削和統治。

所謂“收入革命論”的鼓吹者宣揚，近一、二十年来，在美国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发生了日益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主要是职工和小生产者）的“革命”。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庫茲涅茨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和儲蓄中的比重》一书。該书不仅用个人之間的收入分配来掩盖階級之間的收入分配，而且故意給壟断資產階級少算許多收入（如公司的未分配利潤、逃稅和避稅的收入等等），捏造出他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所有的“人民資本主

• 美国經濟学家維克托·佩洛在其《收入“革命”》（中譯本名《美国各阶层的收入分配》，財政經濟出版社1954年出版）一书中，对庫茲涅茨的这本著作进行了系統的揭露和批判。



义”的鼓吹者，都宣扬美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似乎已经驳倒了“共产党人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宣传”。近几年来，肯尼迪政府的重要顾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现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加耳布莱思的《富裕社会》等书，更是竭力宣扬美国社会的“富裕”，吹嘘它达到了“高额群众消费时代”。

许多人(如萨尔瓦多里、布劳之流)还援引股份资本“分散”的谬论，来宣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有来自劳动和资本这两个来源的收入”，并胡说这“足以抹平尖锐的阶级划分”。此外，所谓国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工会组织的经济斗争等等，也被渲染为促成“收入革命”的因素。总之，“收入革命论”者竭力否认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事实，掩盖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抹煞阶级对立。

从以上这几种主要谬论来看，“人民资本

主义”的鼓吹者无非是宣扬：通过股份公司的扩大股票发行、管理职能和资本所有权的“分离”，垄断资本企业已经或正在日益为人民所“占有”和“管理”，同时人民也由于获得“资本收入”而日益“富有”。尽管他们中间有许多人还同时强调了其他因素，但几乎一致地都吹嘘股份公司的“革命”作用，把它捧为“革命的工具”、“理想的工具”等等。

美国垄断资本集团还利用“人民资本主义”这块招牌，来扩大股票发行。不少垄断企业(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等等)大力发行股票，实行各种利诱企业职工购买企业股票的“计划”。纽约证券交易所甚至自诩为“人民资本主义的基石”。

“人民资本主义”的论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出笼之后，西德、奥地利、英国、日本等许多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也都群起鼓吹。他们宣传的内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目的则是一致的。

二

既然股份公司是“人民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们玩“人民资本主义”戏法的魔棍，那么，了解一下股份公司制度的实质及其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将有助于识破“人民资本主义”的骗局。

当资本主义还处在自由竞争的阶段，社会化的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已经不能单纯依靠个别资本的积累来实现，而要求把

许多个别资本集中在一个股份公司里，以摆脱个别资本数额有限的束缚。由于股份公司实现了巨大的资本集中，资产阶级才有可能举办过去无力举办的大规模的生产事业。马克思说过：“如果必须等待积累，来使若干个别资本大到可以承当铁路建筑事业的程度，然后再来建筑铁路，恐怕世界今天还会没有铁路出现。但集中会通过股份公司，一



反掌間，就把它弄成功。”^① 所以，股份公司是适应資本和生产集中的需要而出現的資本主义企业組織形式。股份公司制度的推行，加速了資本集中和生产积聚，从而推动了資本主义进入腐朽的、垂死的壟断資本主义阶段。

在壟断資本主义条件下，股份公司成为基本的企业組織形式，成为財政寡头对广大人民实行經濟統治的重要工具。

首先，股份公司是資本集中的工具。財政寡头用这个工具来动員閑散貨幣資本和零星資金，將它們集中在自己手中。股份公司組織程序一般是这样：一小撮壟断資本家集合一定數額的資本，創立股份公司，发行股票，把一部分留給自己，把其余股票出售；而持有股票者都成为企业的股東，有权根据股票的票面額从企业盈利中領取一份收入——股息。公司成立后，由股东大会选举最高领导机构——董事会。在这里，有选举权的不是股東而是股票，即有多少股票便有多少选举权。这种虛假的“公司民主”，保证了壟断資本家能够掌握董事会和公司的领导权力，从而支配从其他股東手里收集来的資本。壟断資本家犹嫌不足，还通过出售所謂“优先股票”（有稳定的收入而沒有选举权的股票），和保留所謂“普通股票”（收入不固定而有选举权的股票，有的还是“多权”股票）等詭計，更牢固地將公司的权力和財產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股份公司制度的帮助下，“大資本合并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股東們的

不大的零星資本，变得更加雄厚了。”^②

对于財政寡头們說，购买其他公司的股票、实行“参与制度”，是一种更加重要的进行資本集中的手段。大股份公司购买其他股份公司的股票达到一定數額（例如百分之二、三十左右），便使之成为自己控制的“女儿公司”；还可以通过“女儿公司”收购其他公司的股票，使之成为自己的“孙女公司”。財政寡头通过这种多級的“参与制度”，組成了一个从“母亲公司”到“女儿公司”、“孙女公司”的控制体系，从而掌握了超过其自有資本許多倍的資本。例如，洛克菲勒家族在一九五六年所控制的資產（六百一十四亿美元），竟为其自有財產（三十五亿美元）的十七倍以上。

掌握公司的控制权的壟断資本家主要是拿其他股東的而不是拿自己的財產来冒險，千方百計地进行詐欺。例如，攫取巨額的“創業利潤”（股票价格*總額和投入企业的真實資本總額之間的差額）；实行“資本滲水”（发行的股票額超过企业的真實資本額）；將大量紅利分給“普通股票”；甚至伪造財務決算表，隱瞞巨額利潤，等等。总之，“公司的創

* 股票价格是資本化了的股息。股票价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股息的多少和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其次取决于該公司股票供求关系。

① 《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91頁。

② 《資本主义財富的增长》。《列寧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94頁。



立，股票的发行和股票的买卖，引起一整个体系的詐欺。”^① 壟斷資本家还利用每一次經濟危机的机会，洗劫其他股东，吞并其他股份公司。这种情况，正好证明了馬克思在十九世紀中叶的預見：在股份公司制度下，“成功与失敗，同时都引起資本的集中，使剝夺依最惊人的规模来进行。在这里，剝夺已經由直接生产者，推广到小資本家和中等資本家了。”^②

其次，股份公司被財政寡头用来建立对企业的絕對控制。

如前所述，財政寡头可以凭持有能够使他控制該企业的一定数量的股票盘据董事会。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机构，其职权主要是：选举和任命董事长、總經理、副總經理、若干专业經理等领导人員（在美国，董事长常兼總經理）；确定公司业务的总方針；审查企业经营的结果；分配利潤等。總經理向董事会負責并提出报告，董事会向股東們

（自然是大股東）負責并提出报告。董事长、董事、經理的名单，其实是在选举前由少数大股東在幕后拟定的；他們或者是財政寡头的家族成員，或者是他們的亲信的代理人，但不管怎样，他們都是財政寡头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者和执行者，体现着財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在股份公司产生以后，虽然出现了資本所有权和管理职能分离的表面現象，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財閥們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相反地是剝夺了广大的中小股東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力。

总之，在现代資本主义經濟中，股份公司的使命，是帮助財政寡头們建立其对全体劳动人民的經濟統治，决不像“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所說的那样，是实现所謂資本“分散”和“剝夺”財政寡头对企业的控制权力。实际上，它已經扩大和加强了壟斷資本对劳动的榨取，加剧了劳动人民貧困化的过程，激化了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三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股份公司的所謂“革命”作用，粉碎了所謂“人民資本主义”的謊言。

“資本民主化論”者把股票扩大发行的現象渲染为資本“分散”的趋势，宣揚壟斷資本企业已为人民“占有”。然而，现实却完全与此相反。

近数十年来，美国的股份資本明显地表

現出集中的趋势。据美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罗伯特·藍普曼在今年年初出版的《1922—1956年最大的財富所有者在国民財富中的份額》一书中說，占美国成年人百分之一的人所拥有的股票价值，在全部股份資本总值中的

① 《資本論》第3卷，第560頁。

② 《資本論》第3卷，第561頁。



比重：一九二二年是百分之六十一點五，一九二九年是百分之六十五點六，一九五三年是百分之七十六，而現在至少占四分之三。至于美国劳动人民，特别是产业工人很少持有股票。据美国一位学者密尔斯统计，制造业工人中百分之九十八点六都没有股票。美国工资劳动者所持有的股票总值（包括工头的股份），只及洛克菲勒家族在“新泽西美孚油公司”这一家公司中所持有的股票价值的一半。面对这个事实，连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里汝斯顿也认为宣扬股票广泛分散是“一种可怜的说辞”。

职工即使持有股票也决不意味着他们参与对企业的占有。第一，少量的股票在职工手中并不会使他们成为有产者。事实上，他们还是无产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忍受资本家的剥削。而且资本家随时可以把他们赶出企业。第二，工人虽然凭小额股票获得一点收入，但是他们决不能获得对企业的任何控制权。何况有的公司（如“福特汽车公司”）只将没有选举权的股票售给职工，有的公司（如“艾索美孚油公司”）规定由一家信托公司掌管职工的股票。所以，职工决没有像垄断资本家那样，通过购买股票便取得了企业的所有权，而是使自己菲薄的储蓄变成了公司老板手中用以压迫自己的资本力量。

对于公司老板说，向职工推销小额股票，不仅没有“分散”企业的所有权，反而加强了他们的经济实力。因为他用更少的资本就足以

控制全公司的财产；可以更便当地操纵一切权力，为所欲为。

明明是资本集中，却说成是资本“分散”；明明是垄断资本家加强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却说成是劳动者“占有”了垄断资本家的企业。这是强盗的逻辑！

美国的现实，也完全揭穿了所谓“经理阶级”剥夺了财政寡头对企业的支配权力的谎言。

“经理制度论”者所吹捧的董事、经理等决不是什么“新阶级”，正如美国经济学家佩洛所说，他们“如果不是财阀的家族成员也基本上是出身于资产阶级的上层”。他们是被持有股票控制额的财阀委派来执行管理职能的，忠于职守犹恐不及，自然谈不上“剥夺”老板的权力。

“通用电气公司”被誉为摆脱了“银行和投资人意见的监督”的所谓“经理控制”的典型之一。根据一九五四年情况，该公司的董事会的十六名董事中间，七名是摩根银行的董事，四名与摩根财团有密切联系；公司的主要经理人员也多是由摩根财团及其联盟者（波士顿财团）共同挑选的；连它的诉讼案件，也是由与摩根财团有联系的怀特与凯斯特律师事务所办理。事实上该公司完全处于它的最大的股东——摩根财团的控制之下。

经理人员的任务就是执行垄断资本的机能——榨取最大限度利润。连华尔街的喉舌《幸福》杂志一九五一年二月号的一篇吹嘘



“經理革命”的文章，也认为所謂經理人員不关心利潤的說法“至少是天真的”。同时經理人員自己都拥有大量的股票，并在“薪金”、“津貼”、“獎金”等名目下获得巨額的壟斷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財政寡頭們普遍采取了一种給經理人員低价售与股票的奖励“計劃”，就为的是“要給那些对公司真正有貢獻的少数人提供額外的刺激”，即鼓励他們更积极地为自己榨取利潤。正如美国学者密尔斯所說，“經理是大所有者的代理人，而不是小所有者的代理人”，“富豪在公司中的地位拥有私人財產制度所固有的一切权力和特权。”

美国的现实，还完全揭穿了所謂职工的股票收入日益“削弱”了資本主义剝削的謬論。据統計，持有股票的一般职工一年获得的“紅利”約有四十美元，而一个“福特汽車公司”的工人，即使根据右翼工会的統計，一年至少要給福特財团創造六千美元的利潤。这种微不足道的“紅利”，何济于职工的貧困，不过是福特家族用来使职工忘却惨重

剝削的一种麻醉剂。此其一。其次，所謂“职工股票”彻头彻尾是一个騙局。仍以“福特汽車公司”为例，它曾宣布一周有一百美元收入的职工可以参加购买有价证券（一半是公債，一半是公司股票）的“計劃”。規定公司按半价将股票售給职工，但职工必須在五年內每周扣除百分之十的工資来购买。但是，职工中間有几人能够在五年內都一直有工作并且每周都負担得起这笔开支呢？一旦危机来临，公司解雇，股票价格下跌，职工連老本都将丢掉。連右翼工会头目也认为，这“計劃”对广大职工毫无“实惠”。其实，这不过是福特家族对职工实行又一次“文明的”掠夺。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股份公司不可能而且事实上也沒有使現代美国資本主义“革命化”或“人民化”，只是加强了壟斷資本集团对人民的榨取和統治。“人民”和“資本主义”两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只有經過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資本主义制度，人民才能成为生产資料的主人。

四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所兜售的反动論調，决不是什么新玩意儿。例如，所謂“資本民主化論”、“經理制度論”曾先后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美国出現过。至于所謂“收入革命論”，不过是美国长期流傳的“階級利益調和論”的又一个变种。这些說法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之所以盛行起来，并冠以“人民資本主义”的招牌，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別是随着东風压倒西風的国际形势的出現，美国壟斷資本集团亟需把“資本主义”描繪成“一个有前途的而不是垂死的社会”，以抵制



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吸引力；亟需掩盖腐朽的壟断資本的統治，欺騙劳动人民，以窒息无产階級的革命斗争。“人民資本主义”正是适应这种需要，由壟断資本集团及其辯護士們一手抓着股份公司的表面現象，一手擲来最陈腐、最庸俗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湊成的反动貨色。

壟断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之所以这样大肆鼓吹“人民資本主义”，是有它的政治經濟目的的。

壟断資產階級把“人民資本主义”的宣傳，作为抵制社会主义經濟制度的深远影响和粉飾現代資本主义的一种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現，社会主义陣营已經包括了全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而人口已占全地球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社会主义經濟的欣欣向荣和資本主义經濟的危机重重，形成了鮮明的对照，吸引着資本主义国家的广大劳动人民向往于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他們便大肆宣揚“人民資本主义”来美化壟断資本的統治，迷惑資本主义世界的劳动人民，使其放棄革命的理想和斗争。有的“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还詆毀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經濟为“国家資本主义”，吹嘘“人民資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为优越，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美国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凱尔索和阿德勒在一九五八年出版的《資本家宣言》一书中，提出要以《資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以所謂“資本主义革命”来阻擋社会主义革命，建

立一种所謂“正当的資本主义”，即“一切人都作为資本家参与生产”并“享有經濟平等”的資本主义。

“人民資本主义”的宣傳又是美国壟断資本集团反对国内工人階級斗争的一种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主义的影响日益扩大，美国壟断資本集团日益感到要窒息国内工人階級斗争，除了繼續采取鎮压手段外，仅仅收买一小撮工人貴族已經不够，便強調要用“股票”、“紅利”这根金黃色的鎖鏈，把劳动人民牢牢禁錮在壟断資本的統治下。他們強調必須用发行“小額股票”的办法“使大多数人都感到他們分享到利潤制度的利潤，否則他們就会决定要别的制度”^①；強調必須让每个人“都拥有与我們資本主义制度利害与共的东西（不动产、政府債券或股票）”^②；叫嚷資本的所有权越是能够在“全民”中間分散，将越有可能阻止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并且把这种做法宣傳为“人民資本主义”。实际上，这不过是壟断資本家掠夺和奴役工人的一种新手段。資本家推銷股票給自己企业的职工，不但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資收入变成剝削工人的資本，而且做了种种剋扣工人的規定，例如不少壟断企业（如“美国鋼铁公司”）規定职工如擅自“停工”或因有“过错”而被开除时，他們的股票便被宣布作廢或停止分紅。这样，就有利于資

① 約翰斯頓：《新資本主义》。刊《讀音文摘》，1946年8月号。

② 《新聞周刊》，1956年7月30日，第61頁。



本家扼杀工人的反抗，使工人听任他們的宰割。

“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还为財政寡头通过国家来榨取劳动者的国民經济軍事化和通货膨胀政策进行辯护。他們当中有一些人沿用凱恩斯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是龐大的国防支出等等“对购买力的人为刺激”的結果，并认为龐大的国防支出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要保证“充分就业”。他們还把国民經济軍事化，歪曲为出自劳动人民的“需要”，认为这是多数劳动者沒有掌握私人資本以前，解决就业問題的一种手段，企图用“人民”的外衣，来装扮当前美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凱尔索和阿德勒还拟制了一系列标榜为“人民資本主义”的政策。除了散布由資产阶级国家“制止”資本私有权“过度”集中的謊言外，他們还說什么全民成了“資本家”而极力主張：政府应采取規定公司将全部淨收入分給股东的立法；应取消公司所得税和調整个人所得税；应取消提高工資和各种失业“救济”的立法。显然，实施这些政策，只是为了进一步地掠夺劳动人民，加强壟断資本家

的統治。

美国壟断組織还在自己的海外殖民企业中推行“資本民主化”的“計劃”。例如，据美国《福柏斯》杂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五日报道，两家在非洲的美国銅矿公司宣布五百名工資較高的非洲工人有資格参加“购买股票計劃”。它供称，該計劃的目的，是使当地劳动人民“亲身体驗私有制的好处”，并和美国殖民企业的“所有权发生一种利害与共的关系”。这說明，美国壟断組織阴谋用“人民資本主义”的宣傳和政策，来毒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識和民族意識，妄图扑灭民族解放斗争。

从以上所揭露的种种政治、經济的目的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壟断資产阶级和它的代言人所进行的关于“人民資本主义”的叫囂和他們所采取的相应的措施，不过是美国壟断資本集团进行垂死掙扎时所抓住的一棵水草。“人民資本主义”决不能挽救美国壟断資本主义的灭亡。美国的未来决不属于美国壟断資产阶级，而属于美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

更正

本刊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第二十四頁右栏末一行的“該做的工作就必然很多”一句，应删去。



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

張友漁

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在历史上是資產階級革命胜利的产物。資產階級實行議會制度，標榜“主權在民”、“議會至上”、“自由平等”等資產階級的民主原則。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上一般都規定，議會是由有公民權的公民選舉產生的，是“表達公民意志的機關”。資產階級的這種民主制度，同封建地主階級的等級制度相比較，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資產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只是用一個剝削階級的統治代替了另一個剝削階級的統治，這就決定了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只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議會制度是資產階級對廣大勞動人民實行專政的一種工具。可是，資產階級總是掩蓋議會的階級性，他們一貫把議會裝扮成全體人民的代議機關，製造“全民民主”的假象。適應着資產階級的要求，修正主義者也把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吹捧為“純粹的民主”。例如，老修正主義者考茨基說，包括議會制度在內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能夠“使國家的全體成年成員……具有完全的平等權利”和“保護國家的反對派”。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者的謊言，顯然是經不起歷史事實的駁斥的。

從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到帝國主義時期，資產階級議會所具有的權力和所起的作用，

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由於無產階級還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資產階級曾較多地利用虛偽的議會民主來對勞動人民進行統治。同時，自由競爭要求在資產階級內部實行民主制，議會當時在解決資產階級內部的利害衝突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資產階級議會在這個時期的權力和作用比在帝國主義時期要大。恩格斯在考察了英國國家制度後指出，英國“實際上下院在頒布法律，並通過內閣大臣們（他們只不過是下院的執行委員會）來管理國政”^①。這一句話真實地描述了資產階級議會在當時的權力和作用。

到了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的權力逐漸集中到政府手里，議會的權力被削弱了，它實際上處於從屬於政府的地位。這是因為帝國主義時期，壟斷代替了自由競爭，經濟上的壟斷，必然要求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和政治上的壟斷。控制着巨大財富的壟斷資本集團，就愈來愈大地擴大軍事官僚機構的權力，不斷地降低議會的作用，使議會從屬於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同時，壟斷資產

^① 《英國狀況 英國憲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84頁。



階級為要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潤，加緊了對本國勞動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剝削和壓榨，這就使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化，資本主義國家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人民的反抗越來越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更有效地對外加緊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鎮壓民族解放運動，並且鎮壓國內人民群眾日益強烈的反抗，絞殺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也必須擴大軍事官僚機構，加強政府的權力。列寧指出：“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就是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上層建築，就是從民主制轉向政治反動。自由競爭要求民主制。壟斷則要求政治反動。”^①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議會雖然在形式上仍享有立法和監督政府的職權，但實際上，議會的立法權卻往往被政府通過所謂“委託立法”和緊急命令權等等所代替。所謂議會監督政府，也由於政府控制了議會中的多數黨而有名無實。正如列寧所說：“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后台決定而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來執行的。”^②這已不像恩格斯所說的那樣，內閣“只不過是下院的執行委員會”了。就是資產階級學者也並不否認這一點，英國資產階級法學家詹寧斯就曾露骨地說，議會對政府的“控制成分實在是微不足道的。……雖然從某種觀點上說，下議院控制了政府，但是從另一種更為實際的觀點說來，却是政府控制了下議院”。

議會民主的虛偽性在帝國主義時期是更

加顯露了。有些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產階級，在有些時候，採取公開的法西斯化的形式實行專政，拋棄掉了議會民主的形式。在還保存着議會民主形式的帝國主義國家里，議會也只是壟斷資產階級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他們各個集團之間的矛盾，為了欺騙勞動人民，為了在國內和國外推行反動政策製造所謂法律根據而利用的一個工具。

資產階級用兩黨制、多黨制和三權分立制來掩蓋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他們說，兩黨或多黨輪流在議會里控制多數就能夠反映人民的意志，三權分立就可以使議會制約住行政和司法的專橫，這樣，資產階級議會似乎真是什麼“全民”的民主組織了。

資產階級政黨通過競選方式，爭奪議會議席，並使得議員有所更替。從表面上看來，似乎他們據有議會議席，是經過人民選擇了的。實際上，這些不同名目的資產階級政黨，誰占有議會的席位，對於勞動人民來說，都是換湯不換藥。美國是兩黨制的國家。可是，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是美國壟斷資本家的忠實走卒，它們無論哪一個在議會中占多數，都執行着美國壟斷資本集團的政策。法國實行多黨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議會中資產階級政黨的力量經歷了很多變動，但是法國議會始終為資產階級所控制。資產階級議會制度的本質，正如列寧所說的，不過是“每隔幾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

① 《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諷刺和“帝國主義經濟主義”》。《列寧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4頁。

②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410頁。



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人民”^①。

資產階級特別把資產階級各个政党之間的爭吵，吹噓為民主的表現。各个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期間，往往對它的競爭對手進行謾罵、攻擊，對選民許下許多諾言；在議會開會期間，他們也進行着無休止的清談和爭吵，有時甚至吵得很激烈。而實際上，他們之間的種種爭吵，歸根到底，只是各个壟斷資本集團經濟上的競爭和傾軋在政治上的反映，只是他們對勞動人民實行專政和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具體做法上的意見分歧。至於資產階級政党在竞选中對勞動人民許下的諾言，不管多麼動聽，都是一文不值的，只要選舉一過，他們就將這些諾言置諸腦後，他們的所作所為，往往完全違反自己的諾言。

資產階級標榜所謂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議會、政府、法院互相制約，這也無法掩蓋資產階級議會的階級實質。三權分立的學說，是在資產階級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產生的。這種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國家權力應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這三種權力分別由議會、政府和法院行使。那時的資產階級企圖由他們所控制的議會來限制還在封建勢力手裡的行政機關的權力，使它不致過於專橫。三權分立的學說，在反對封建制度的時候，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在資產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以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都被資產階級所掌握，用來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因此，就談不上什麼權力的分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和資產階級的政府、法院，只不過是進行着分工以實現資產階級的統治罷了。

資產階級議會民主的虛偽性，明顯不過

地表現在資產階級議會的全部選舉活動中。資產階級為了達到控制議會的目的，千方百計地阻止無產階級政党和其他勞動人民的代表進入議會。

資產階級首先是利用法律對選民的資格規定種種限制。例如，法國一七九一年憲法規定：公民按財產多少分為“積極公民”和“消極公民”，只有“積極公民”才有選舉權，而“積極公民”的主要條件是交納一定的直接稅。當時法國二千六百萬人口中，“積極公民”只有四百萬人。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由於勞動人民長期鬥爭的結果，資產階級在選民資格問題上作了某些讓步。例如法國（一八四八年）、德國（一八七一年）先後在法律上宣布了男子的普遍選舉權，英國（一八八四年）也進一步縮小了直接的財產的限制。但是，在西歐大多數國家，到十九世紀末，還只有約近百分之五的居民參加了選舉。在一九〇〇年，英國選民的數目只相當於居民總數的百分之十一。

從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雖然大都先後取消了对選民資格的直接的財產的限制，但是，間接的財產的限制還是很多。有些國家規定，公民要取得選舉權，必須在一定的選區內居住不少於法定的期限，具有一定教育程度，繳納一定賦稅等。例如，美國很多州和地方的法律都規定了居住一至二年的限制，不少州要求選民通曉英語並能“正確地講解憲法”，美國南部有七個州的法律規定，選民必須繳納一定賦稅後才能投票。許多勞動者經常處在失

^① 《國家與革命》。《列寧全集》第25卷，第409頁。



业半失业的状态中，到处颠沛流离，很多人不可能有固定的居住地点；他们受不起教育，自然大多数人没有能达到所要求的教育程度；他们收入微薄，不得温饱，或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当然缴不起税。因此，劳动人民仍然由于财产的限制而被剥夺了选举权。资产阶级借助间接的财产的限制来排除劳动人民参加选举，是更加狡猾的一种手法。它比直接的财产的限制容易欺骗人，而收到的效果却一样。据《纽约时报》报道，在美国一九六〇年选举中，就有八百万人因为居住资格的限制，一千二百万人因为教育程度和选举税等等限制，而被排斥在选举之外。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还采取了种族限制的办法。在美国，对黑人选举权的限制十分突出。美国统治集团使用很多方法阻止黑人进行选民登记。例如，美国南方各州主管选举的官员，经常向黑人提出一些只有学法律的大学毕业生才能回答的问题，当他们回答不出，或者只因为有一个拗口的字念得不对就要被剥夺投票权。据美国民权委员会一九六〇年的报告，在美国南方各州，已达到投票年龄的黑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进行了选民登记。

上面说的种种选举资格的限制，实际上否定了资产阶级宪法和选举法形式上宣布的普遍选举权，使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选举权遭到剥夺，对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代表进入议会设下了第一重围墙。

其次，资产阶级还规定了许多限制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候选人的办法。例如，美国有些州规定，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外

的任何第三个党，如在上一次选举中未取得一定数量的票数，它们在提出候选人时，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选民签名表示支持，才能参加竞选；对签名人数的规定，有的竟多到几万人。但事实上，签名支持美国共产党候选人的人，就有遭到严重迫害或丧失职业的危險；签名人的家属和亲友，甚至也要受到联邦调查局等特务机关的追究。这样，美国共产党实际上被剥夺了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参加竞选的权利。同时，根据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选举法的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巨额的保证金。在英国，候选人须缴纳一百五十英镑的保证金，如果候选人所获选票不到投票总数的八分之一，保证金就要被没收。在法国，根据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缴纳十万法郎作保证金。这种保证金对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样，即使一部分劳动人民取得了投票的权利，但是由于他们不可能或者难于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这种投票权利也变得毫无意义。

第三，资产阶级还运用修改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等措施，使议员的选举获得有利于他们的结果。

资产阶级总是根据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来运用选举制度。在资产阶级力量较强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一般都采取多数选举制。由于他们在各个选区大都能有把握获得较多选票，采取这种制度，就使他们能攫取绝大多数甚至全部议席。如美、英等国就是采取这种选举制度的。在意大利，一九五一年二月，以基督教民主党为首的右翼



集团在議會通过的关于市政委员会选举法，也是采用的多数代表制。对于这样一个反动的选举法，意大利当时的内政部长謝尔巴曾毫不隱諱地宣称，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削弱共产党通过市政委员会操纵国家生活的那种势力”。在资产阶级政党較多、资产阶级力量比較分散的国家里，他們可能采取比例选举制。这种制度是按照各政党所获选票的多少为比例来分配議会的席位，它可以使林立的资产阶级政党都在議會中获得一定席位，同时，还可以防止获得較多选票的无产阶级政党得到更多的議席。

但是，当资产阶级看到共产党的影响扩大，現行选举制度不利于他們的时候，就要对选举制度加以修改，采取更加反动的选举制度，以保证得到有利于他們的选举結果。例如，一九五一年法国国民議會就通过了选举制改革法，以“一輪多数联盟制”代替了原来的比例选举制。根据这一制度，各政党可以結成联盟参加选举，如某一政党或政党联盟获得某选区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即可独占該选区的全部議席；如都得不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选票，該选区議席即按各党所得票数比例分配。法国在一九五一年的选举中，由于法国政府使用这一选举制度，使得法国共产党虽然获得了五百多万張选票，但只能在議會中获得九十四個席位。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戴高乐政府又采用了“单一提名二輪多数制”。根据这一制度，在每一个选区中只选出一名議員，在首輪投票中候选人必須获得絕對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沒有一个候选人获得絕對多数选票，即进行第二輪

投票。在第二輪投票中，参加竞选的政党获得相对多数就可以当选。这样，资产阶级政党就可以結成联盟爭取相对多数来对付共产党。因此，在一九五八年的选举中，共产党虽然在第一輪投票中获得了三百八十八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九，在第二輪投票中获得了三百七十四万余票，占投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点七六，但总共只得到十个議席，还不到議席总数的百分之二；而在第一輪投票中，得票少于共产党的极右政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却窃取了一百八十八席。

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能选出他們的代表，还采取了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以削弱共产党的力量。他們在重新划分选区时，把无产阶级力量占优势或直接控制的地区，不划为一个选区，而把它分成若干块，分别并到保守力量占优势的选区里；或者在无产阶级人口占优势的工业区减少选区，而在保守势力有較大力量的农业区增設选区。前一办法使无产阶级政党无法集中选票，选出自己的代表；后一办法則使无产阶级不能按照票数的比例选出自己应有的代表。

由于资产阶级采取了反民主的选举制度和重新划分选区的办法，即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也难于当选。

第四，资产阶级还通过政治、經濟、軍事的力量，操纵和控制选举，用种种卑鄙手段阻止人民正确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歪曲选举的結果。

资产阶级往往在进行竞选活动时，使用大批金錢，动員所有的宣傳工具，向选民进



行欺騙宣傳，同时，雇用一批流氓騙子為他們張羅選票，或者直接收買選票。一九五三年意大利議會選舉中，資產階級右翼政黨花了几十億里拉（意貨幣名）來進行競選活動。他們對鄉村和其他居民區中的選民贈送通心粉，有些地方送給選民一只左脚穿的鞋，同時告訴這些選民，如果他們的候選人當選，還會得到那只右脚穿的鞋。選民有時還得到半張一千里拉的紙幣，如果給他們錢的候選人當選，他們就可以得到另外半張紙幣。收買選票的情況，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同樣是十分驚人的。在金錢收買的同時，資產階級還兼施政治威脅。西德在一九六一年大選時，僅僅在七月底八月初的一個星期中，西德警察和司法部在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就逮捕了六名以個人身份作為聯邦議院候選人的德國共產黨員。

資產階級在選舉中營私舞弊的行為是不勝枚舉的。他們有的在進行選民登記時，故意不把一些具有選舉資格的勞動人民列入選民名冊；有的把已死或已遷出的人登記進選民名冊，然後用這些人的選民證投資產階級政黨的票；還有的用造假票和換票等方法來使自己的候選人當選。

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人民力量強大的情況下，資產階級如果靠上述那些辦法還達不到目的時，他們就派出軍隊、警察、特務、打手，用反革命的暴力和血腥的鎮壓，來保證他們的候選人當選。他們或者殺害、迫害共產黨和其他進步黨派的候選人，或者採取各種野蠻的暴力行為，阻撓替進步候選人進行選舉鼓動，或者在選舉日出動大批軍警，鎮

壓選民。日本一九六〇年眾議院的選舉中，池田政府除了頒布反動法令，剝奪人民集會、游行的權利，限制人民的選舉自由以外，還專門召開了全國警察頭目會議，調動了一萬八千名刑事警察和五萬名便衣警察，加強對民主力量的鎮壓，特別是採取了最殘暴無恥的手段破壞日本共產黨的競選活動，並且唆使法西斯暴徒殺害了社會黨領袖淺沼稻次郎。當時，共同社也不得不承認這次選舉是“嚴重破壞公正選舉的金錢和權力的選舉”。

第五，即使共產黨和其他勞動人民的代表通過重重障礙當選為議員，資產階級還可以採取種種手段來否定選舉結果。資產階級可以宣布全國或部分地區選舉“非法”，重新進行選舉；可以利用資格審查，確認某些議員不具備當選條件；可以借口維護議院秩序，將議員加以“擾亂秩序”的罪名予以開除。資產階級用這種種辦法剝奪已經當選的共產黨和其他勞動人民代表的代表權，把他們排斥在議會之外。甚至當共產黨所支持的某個資產階級政黨在選舉中獲勝，不利於整個資產階級的統治時，他們也要否定選舉的結果。這裡可以舉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在阿根廷，由於親美賣國的執政黨（不妥協激進公民聯盟）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選舉中失去十二個省的席位和眾議院的絕對多數，而共產黨所支持的庇隆主義黨卻獲得八個省長的職位和眾議院中的四十三個席位，阿根廷統治集團竟於三月二十日下令取消庇隆主義黨在五個省贏得的選舉結果。四月二十四日它進而取消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以來的所有省市選舉結果（實際上取消了庇隆主義黨在十



一个省当选省长的结果),四月二十五日又取消了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八日的联邦选举的结果。五月二十日阿根廷统治集团进一步地悍然宣布停止议会工作,命令改组政党。

大量事实表明,资产阶级总是能够使用各种伎俩,甚至采用实际上把共产党置于非法地位的办法和采取暴力行动,阻挠共产党的代表进入议会,使共产党难以在选举中获得资产阶级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或者使共产党一个席位也得不到。在美国国会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直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分据了国会的席位(从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的第七十九届国会到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的第八十三届国会,只有进步党和美国劳工党各占有一个或两个席位,从八十四届到现在的第八十七届国会,席位则完全为民主党和共和党所占有),国会中根本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席位。西德一九六一年选出的联邦议院,全部席位为三个资产阶级政党所瓜分。其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占二百四十一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占一百九十一个席位,自由民主党占六十六个席位。在英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只是在一九四五年的议会选举中有过两个席位,在这以后的五届选举中,资产阶级一直没有让共产党获得一个席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而战后最初几年,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中,共产党的席位一度有了增长。但是,这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产阶级的议会的本质。而且资产阶级总是能够设法削弱共产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很明显的事实是,法国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曾

一度争得较多的席位,但是资产阶级却不让它能够稳定地保持住这些席位。法国共产党一九五六年在国民议会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占了一百五十一个席位,可是,一九五八年由于戴高乐政府采取了有利于资产阶级的选举法,就使法国共产党在国民议会中的席位,骤降为十个席位。法国共产党是法国第一大党,但目前它在议会中却是少数派,即使在戴高乐上台以前,资产阶级也没有让它在议会中占过绝对多数。在意大利,共产党在议会中占有的席位,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是多一些,但是,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中仍然拥有多数席位,而共产党在众议院的五百九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一百四十个席位,在参议院的二百四十六个席位中只有五十九个席位。

资产阶级除了在选举中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以外,还运用各种手段来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发生作用,以至剥夺他们的发言权和人身自由。因此,共产党即使在议会中获得一定数量的席位,他们的活动仍然会由于资产阶级的破坏而发生种种困难。

资产阶级仅仅是通过他们所谓“合法”的手段,就可以大大地限制共产党的代表在议会中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发生影响。他们首先是操纵议会的表决机器,通过有利于他们的决定,而对于带有进步意义的提案,往往运用议会的常设机构加以搁置,或者玩弄烦琐的立法程序和多数表决等手段加以否决。

当资产阶级感到议会这个工具有些运用不灵时,他们还可以公开修改宪法,扩大行政机构的权力,以进一步削弱议会的作用。法国一九五八年通过的戴高乐的宪法就规



定，總統有权任免总理、政府其他成員和軍事人員；在所謂非常时期，總統还有“根据形势的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的全权。这样，大权实际上集于總統一身，議會立法权則削弱到仅限于对十几种事項作原則的討論和規定，具体立法則由政府制定，而且政府还可以要求議會將这点有限的立法权的一部或全部委托政府代行。同时，議會通过的法律，还必须由政府操纵的宪法委员会审查后，才能公布生效。凡是宪法委员会认为不合宪法的法律，就可以不予公布。至于議會組織政府的权力，实际上也取消了，因为按照宪法規定，總統任命总理和政府其他成員，不需要議會以絕對多数通过信任案。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即令在議會中占有相当多的議席，对于資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决策和活动，不仅不可能起任何决定性作用，甚至不可能起多大的牵制作用。

資產階級为了限制共产党在議會中的作用，甚至連自己制定的宪法也不惜任意踐踏。他們可以違反宪法，破坏議会的法定职权。資產階級还往往运用暴力手段对反对党派議員的人身进行迫害，强制通过他們的法案。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日本岸信介內閣用七百名法西斯暴徒、五百名警察毆打反对党議員，并用三个到六个警察架一个議員的野蛮手段，把共产党和社会党議員赶走，然后由自由民主党議員单独通过了“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約”，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如前所述，資產階級为了保持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統治，不但要利用議會这个工具进行政治欺騙，而且越来越凭借軍事官僚机构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

压迫和剝削。无产阶级要想求得自身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就必须采取革命手段打碎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包括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度，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保障最广大的人民得到真正的民主。但是，在革命时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无产阶级政党仍有必要尽可能利用資產階級議会的讲坛开展斗争，揭露資產階級的欺騙，并以具体事实来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們的政治觉悟。共产党人如果不懂得或者否定利用一切机会在議會內加强对資產階級的斗争，这是不对的。在开展議會斗争方面，各資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不少的工作，它們在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捍卫劳动人民起碼的民主权利和經濟利益等方面，迫使資產階級作过某些让步，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是，这些胜利的取得，也是同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在議會外对資產階級进行的斗争分不开的。事实证明，議會中的斗争必须同群众斗争結合起来，而組織广泛的、深入的群众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議會斗争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同資產階級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唯一的斗争手段。列宁說得好：“为了通过选举和各种党派在議會中的斗争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参加資產階級的議會活动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阶级斗争局限于議會斗争，或者认为議會斗争是最高、决定性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斗争形式的斗争，那就是实际上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而反对无产阶级。”^①

① 《立宪會議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30卷，第241頁。



新的“挑战”和新的“选择”

· 向 阳 ·

“挑战”，这是目前美国当权派人物很爱用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义阵营的繁荣强大，说成是“超越一切挑战之上的挑战”。他们把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说成是今后十年或者几十年的“巨大的挑战”。美国原子垄断地位的丧失，苏美间导弹差距的扩大，等等，都被认为是对于美国的“挑战”。总之，他们认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对于美国的“挑战”的年代。

当二十世纪进入六十年代之际，美国统治集团“选择”了民主党，据说，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挑战”。在洛克菲勒（这是目前美国最富侵略性和有影响的垄断集团之一）兄弟基金会的主持之下，腊斯克（现任美国国务卿）曾主撰了一个叫做《本世纪中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挑战》的研究报告，对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十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思想和目标——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提出了纲领性的建议。同时，亨利·基辛格（现任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问题顾问）也写了一本书叫做《选择的必要》，为美国统治集团提供了应付这些“挑战”的许多“选择”。肯尼迪正是在荷包里夹着这些货色走进白宫的。

难道美国真的面临着如肯尼迪之流所经常嚷嚷的什么外来的“侵略”、“干涉”和“武力威胁”之类的“挑战”吗？显然没有。真实的情况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这两股伟大历史潮流的日益高涨，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确已发生了并且继续发生着不利于美国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变化。腐朽的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受到这种历史潮流的越来越沉重的冲击，而有“日薄西山，危在旦夕”之感。如果“挑战”指的是这个意思，那倒是合乎逻辑的。因为根据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新生的东西总是要向腐朽的东西挑战的，而且最后也必然是要取而代之的。

肯尼迪的一些代言人曾经说肯尼迪的所谓“总战略”的基本目的，概括起来说，就是想在当前面临的“发生了变化的局势”中能够作出“选择”。据说，肯尼迪是要能够“选择”如何应付“挑战”，而不是“让‘选择’加在我们（美国）头上”。他们甚至认为，在肯尼迪的“总战略”中，“选择”这个词儿是一个“关键性的字眼”。

肯尼迪上台以来，究竟是怎样进行“选



擇”的呢？時間雖然不長，花樣確實很多。但是，變來變去，政治上不外搞兩手策略，軍事上不外搞三種戰爭。這就是說，為了更加狡猾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肯尼迪政府既“選擇”戰爭的一手，也“選擇”“和平”的一手，而以“和平”的一手來掩護戰爭的一手。為了進攻和顛覆社會主義陣營，鎮壓和撲滅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鬥爭，肯尼迪政府既“選擇”大規模的先發制人的核武器戰爭，又“選擇”使用常規武器或者“戰術”原子武器的“有限戰爭”，並且已經“選擇”了南越等地作為“特種戰爭”的試驗場。這些所謂“選擇”，已經成為人們的常識，沒有什麼新鮮可言了。

現在，美國當權派人物自己喧嚷，他們又面臨一個新的“挑戰”，因而要被迫作出一項新的“困難的選擇”。

這個“挑戰”來自“自由世界大家庭”的內部，來自美國在北大西洋集團中的西歐伙伴。肯尼迪在今年一月間提出的“國情咨文”中就發出第一次的緊急信號：“歐洲共同市場的發展提出了最大的挑戰”。緊接着，他在“貿易咨文”中又警告說，由於一個“短短時期中的”一些“基本上是新的、全面的事態發展”，美國需要應付“新的挑戰和機會”。到了今年五月間，美國財政部長狄龍更把西歐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作為三個“巨大的挑戰”之一，同社會主義陣營和民族獨立運動的“挑戰”相提並論。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美國統治集團這樣驚惶失措呢？簡單地回顧一下美國統治集團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情形，是頗有意思的。大家知道，在戰後的年代里，美國政府在反共反蘇的旗號下，從執行“復興”西歐的“馬歇爾計劃”，扶植西歐各國的反動勢力、尤其是西德的軍國主義勢力，策劃各種“西歐整體化”的方案，直到建立侵略性的北大西洋軍事集團，無一不是為了在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全面控制西歐。這是美帝國主義的大西洋政策的基石，也是它的“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曾幾何時，形勢的發展完全出乎美國統治集團的意料之外。西歐主要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復，它們要聯合起來同美國爭一日之短長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

對於正“被另一次經濟衰退的陰影所吞噬”、並且一直以西歐國家的“盟主”和“保護人”自居的美帝國主義，這個新的“挑戰”確實具有十分嚴重的性質。因為它既是經濟方面的，又是政治方面的，而且也是軍事戰略方面的。

一個排它性的西歐“共同市場”已經長起牙齒。今年七月一日起，“共同市場”六國內部的工業品關稅將再降低百分之十，總共將降低達百分之五十，某些農產品關稅也將減少達百分之三十五。如果英國也能參加進去，這樣一個處於單一對外關稅保護之下的西歐經濟集團，用肯尼迪的話來說，就將“擁有比我們多百分之五十的人口，他們共同工作，共同進行競爭，……他們的經濟發展速度一直將比我們快一倍”。如果美國被排斥在這個巨大的市場之外，美國就將失去



一个几达三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而无法保持它对西欧的每年六十多亿美元左右的出口贸易额，就将减少大量的外汇收入，增加大量的黄金外流，就会大大加深它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困难。与此同时，这样一个西欧经济集团，也必然要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在广大中间地带的市场争夺战中，成为美国的日益强大的敌手。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转弯抹角地说：“欧洲作为一支单独的经济力量的崛起，还会在争取非洲、亚洲和南美洲不结盟地区的战斗中成为又一个主角。”

不仅如此，一个排它性和竞争能力日益加强的西欧经济集团，必然在政治上要求有更大的发言权，在军事上要求有更大的独立性。法国外交部长德姆维尔毫不含糊地表示：“共同市场根据定义是一个欧洲体系。它必须确定并执行一个共同的对外政策。它必须有一个防务政策。它将一点一点地在大西洋联盟中变成一个同美国平等的伙伴。”这是最近几年来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进行控制和反控制斗争的中心内容。法美矛盾的尖锐化，则是这个斗争的突出表现。雄心勃勃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俨然以西欧代言人的姿态，同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大唱对台戏。他坚持要建立一个“各祖国的欧洲”，一个“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军事上团结的欧洲”，实际上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受美国支配的所谓“平衡力量”或“第三种力量”，同美国分庭抗礼，平起平坐。这当然是对于美帝国主义的“领导权”的露骨的“挑战”。怪不得若干时期以来，美国当权派

人物和代表性报刊歇斯底里地掀起了一个“孤立戴高乐”的运动。

在这个新的“挑战”面前，怎样办好呢？办法之一：钻进“共同市场”，好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皮去捣乱一样，“让我们在法国、意大利或（西）德国建造工厂”（肯尼迪语）。但是，不行，因为这样美国“将会失去资本、黄金和就业机会”。办法之二：“攻心为上”，或者利用英国这匹“特洛伊木马”去破坏扩大的西欧经济集团，或者通过法国和西德内部的反对势力去削弱巴黎——波恩轴心。美国事实上也一直在这样做。但是，看来一时难于收效。办法之三：“以退为进”，如果“共同市场”对美国不敞开大门，美国“就不出钱来承担它在地中海的军事义务”。华盛顿的政客们曾屡次以此相要挟。但是，这更不行，因为美国统治集团的决策人根本不愿、也不敢考虑退出西欧的问题。

显而易见，以上这些办法都不能“选择”。据说肯尼迪终于拟定了一个“宏伟的大西洋计划”，这大概可以说是他的一项最新的“选择”吧！

根据这个计划，第一步，美国将同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欧经济集团达成主要是有利于美国的互相减税或者免税的协议；第二步，将建立由美国领导的、包括“欧洲共同体”在内的“大西洋共同体”。不久以前，腊斯克对此特别作了阐明。他说：“我们期望同一个统一的欧洲合作，这不仅在贸易方面，而且在建立和保卫一个自由大家庭的其他必不可少的工作方面。这些工作不能单独由美国或者



单独由欧洲来完成。我们需要和我们紧密合作的强大的伙伴。这个强大的伙伴将是一个整体化的欧洲。进行密切合作的机构将是越来越团结的大西洋共同体，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和欧洲可以密切合作。”这位国务卿先生煞费苦心，企图用虚伪笼统的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真情实感。这当然是瞒不过美国的“强大的伙伴”的。英国的《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这样告诉美国，“如果欧洲人组织他们自己的共同体，就必须允许他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意思是说，欧洲的事务不用美国指手划脚，越俎代庖。戴高乐更直截了当地给了美国一巴掌，他在法国中部和东部巡视时，冲着大西洋彼岸的肯尼迪说，法国“应该有它自己的人格，因而应该有它的武器、它的政策、它的影响”，“法国并不是由任何其他国家拖着走的”。

很明白，美国的“选择”，并不等于西欧国家的“选择”。“凡是对于美国好的，对于欧洲也是好的”这种愚人哲学显然早已过时了。究竟西欧是美国控制的“超国家的西欧”呢，还是以巴黎——波恩轴心为基础的“统一的西欧”呢？究竟北大西洋集团是美国的“一言堂”呢，还是成员国尤其是主要成员国的“合伙公司”？究竟由美国单独决定是否发动一场首先将毁灭西欧的核战争呢，还

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来“按电钮”？对于这些利害冲突的重大问题，美国有自己的“选择”，西欧国家也有自己的“选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本来就是帝国主义世界的铁则啊！

当然，在“选择”问题上，西欧国家也同样是各打各的算盘。譬如说，不论是在英国参加“共同市场”问题上，或者是在“欧洲政治统一”的形式问题上，还是在拥有核武器和对美国的态度问题上，戴高乐和阿登纳就不可能是真正一致的，而这两个被称为“极权主义的老人”同惯于玩弄欧洲均势的英国绅士麦克米伦，更是难于完全合拍的。

西欧经济集团对美国的“挑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尤其是美国同西欧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重要标志。尽管肯尼迪可以发一百次誓：“我们不能让自己同它（西欧）分开”，“我们不能让它（西欧）离开我们，而要靠攏我们”。但是，帝国主义集团加速走向四分五裂的趋势，却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尽管肯尼迪还会被迫作出这样或者那样的新的“选择”来应付这种或者那种新的“挑战”，但是，对于腐朽透顶的美帝国主义，可供“选择”的余地毕竟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有限了。



利 害 篇

关 鋒

清人梅曾亮的《记棚民事》(《柏枧山房文集》卷十),就开垦荒山一事说到利害关系的问题。其大意如下:

董教曾在任安徽巡抚时,上了一封奏折,为主准许“棚民开山”。其理由是:反对开山的“皆溺于龙脉风水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者;“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梅曾亮看过这封奏折,认为很有道理,表示赞成。可是,后来他到了宣城问及此事,乡人所谈却大不相同,他们说:“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瀝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今以斤斧童其山(把山砍秃了),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沙石随下,奔流注壑,壑中皆填污不可貯水,毕至窪田中乃止。及窪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傭而瘠有税之户也。”梅曾亮觉得这道理也是很对的。究竟是准许开山对还是禁止开山对呢?梅曾亮感慨地说: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也久矣。由前之说,可以息事;由后之说,可以保利。若无失其利而又不至如董公之所忧,则吾盖未得其术也。故记之以俟夫习民事者。”

梅曾亮所说的利害“不能两全”,包括着一个阶级利害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到山上去开荒的无地贫民,同占有平坝沃土的富户,确是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梅曾亮感到困惑的是,如果不准穷人开山,难免闹事;让他们开山,就会造成水土流失,影响山下耕地,难以两全。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贫民和富户间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开垦荒山对于生产的利害问题,却仍然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办法是,既考虑到开山之利,又考虑到开山之害,权衡利害之轻重,得出的结论是:在有些山区,只能封山造林,不能开荒;有些山区则可以有限制的开荒,即根据当地情况限制在一定的坡度之内,同时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在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地方开垦荒地,纵然一时可以得利,但必定遭致水土流失之害,那就一定要坚决保持水土,而不要乱开山荒。这叫做“利中取大”。如果只考虑到开山扩大播种



面积之利，而决定无限制的大片的开山，那就是贪小利而丢大利了。

在社会工作中，在同自然界作斗争中，利害相连的情形是很多的，例如：有些事情直接对当前有利，同时又直接对当前有害，其中有利大害小的，也有利小害大的；有些事情，在当时看来，虽然是有利无害，但经过一系列的中間环节，会生出长远的患害，甚至是很大的患害；也有些事情，对当前有小害，而对长远有大利；还有些事情，从某个局部看来有利，但从全局看来有害，或者相反，对某个局部有暂时之害，而对全局有利。总之，利害相连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古人就多少看到了这一点。战国墨家指出，辩的目的之一，即是“处利害”（《墨子·小取》）。

对于那种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或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事，当然是很容易作出办与不办的决定的；但遇到既有某种利，又有某种害的事，那就必须十分慎重。如果只看到利的方面，看不到害的方面，冒冒失失地办起来，结果可能是贪小利而受大害；如果只看到害的方面，看不到利的方面，看到一点儿患处就不敢设法去办，那恐怕可办的事就很少了。

两千多年前的孙武说过：“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孙子兵法·九变》）。用我们现在的話来说，就是要用“两点論”来看问题，也就是说，必须从客观过程固有的矛盾中，从事物错综复杂的各种联系中，从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的关系中，弄清有利的方面和有害的方面。当然做到这一点是不

容易的，既需要有唯物辩证的思想方法，又需要有对所处理的问题的科学知识。但我们必须力求做到这一点。孙武说：“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得用兵之利也。”*（《孙子兵法·作战》）岂止用兵，做其他事情，也是不尽知其害，就不能获得其利。因为，不尽知其害就不懂得采取何种措施去防患，在沒有准备的情况下，患处还会扩大开来；这样，本来可能得到的利也会得不到。

弄清了利害两方面，就可以设法防患，或者使害缩减到最小限度，因而使利得到最大的保障。不过，也有这样的事情，看清了它的患处，但受着当前科学技术条件的限制而不能防止。碰到这样的事情，只能是权衡利害的輕重大小，从而决定办还是不办。有患害较大，防患问题得不到解决，因而绝对不能动手的；有利大害小，需要忍受一点患害而必须兴办的，因为如果不忍受这点暂时的患害就会遭到更大的和长远的患害。墨家說得好：“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墨子·大取》）。

梅曾亮看到了开山这件事的利的方面，又看到了害的方面，但结果还是不知道究竟应当怎样办才好，这当然是因为他对开山这件事毕竟还没有深知。中国古来也有这样的人，他们看出了利害相连的情形，就宣布說：有一利必有一弊，因而遇事采取消极无为的态度。这是懦夫的态度，当然是我們所

* 原作“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据《通典》校改。



不取的。

但是，人們在对一件事的利害关系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还没有找到恰当的处理办法的时候，暂时采取存疑态度，并积极地去进行调查研究，却是应该的。在某件事情的内部矛盾和它同各方面的复杂联系尚未充分暴露时，我们往往看不到或看不清它的某个方

面。这就要老实地承认，继续调查情况，参照历史经验进行研究，并且同时在典型试验中摸索，逐步地去把利害两个方面摸清楚，找出取利防害的方法。

要做好各种具体工作，需要各门具体的科学知识。梅曾亮说得对，“吾盖未得其术也”。弄清具体事物的利害，以取利防害，那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文艺随笔

朱

馮其庸

古往今来，伟大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总是有它的独特性的。这种独特性，也就是作家在艺术上的独创性。对于许多文艺作品，我们常常能够不看作者的名字就辨认出这是谁的创作，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熟悉作者的独特风格的缘故。

我国的文学史、戏剧史和绘画史，呈现着绚烂多采的面貌，这证明我国历史上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是善于创造独特的艺术风格，善于完满地呈现自己的艺术个性的。从文学方面来说，我国先秦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首先以他独创的艺术风格，照耀着我国的文学史。班固说他的风格“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刘勰说他的风格“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又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

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缙毫。”他们对于屈原风格方面的评论，虽然有详略的不同，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司马迁也是在艺术风格上独树一帜的。唐代的韩愈说他的风格“雄深雅健”；宋代的苏轼说他的风格“疏荡，颇有奇气”；明代的茅坤说他的风格“出风入骚”，“疏荡飘逸”；清代的刘熙载说他的风格“精思逸韵”，“逸气纵横”。这些评语说明，屈原和司马迁风格的独特性是大家所公认的。在绘画方面，我们不必说得太远，就以近百年的画家来说，吴昌硕以篆法作画，喜用重色（大红、大绿、赭、墨等），所作牡丹、菊花、紫藤、葫芦等等，具有一种古香冷艳、浑厚朴茂的独特风格。而白石老人，则又在青藤（徐渭）、八大（朱耷）、石涛和吴昌硕等人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为



是需要有“术”的，也就是说，需要有关于那件事情的具体知识，关于处理那件事情的科学技术。

取利防害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客观规律、利用客观规律的问题。正确地认识了客观规律，学会了以完备的知识利用客观规律，就能取利防害。当然，正确认识和利用

用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需要一个实践过程，要想一下子做到，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这类事物的时候特别谨慎，逐步地探索着前进，在实践中取得经验，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及时地总结经验；这样，新冒出来的事物的规律，就能较早地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利用。

自然景色传神写照，所作牡丹、紫藤、荷花、芭蕉等，独呈质朴浑厚，疏朗清新的风格。白石老人一样善用重色，但又独辟蹊径，不再走吴昌硕沉厚浓艳的路子，而出之以疏爽自然，特别是他所作的蝌蚪、青蛙、虾、大蟹、小鸡等小动物，生意盎然，神韵独造。

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别林斯基说，风格“就是思想本身”，就是“思想底浮雕性、可感触性”。没有自己的鲜明的风格，首先就意味着没有作者自己对于生活、对于现实的独特的见解和深刻的感受，没有妙手匠心的艺术构思和艺术手法，这在思想内容上往往容易流于肤浅，在艺术上则往往容易流于单调。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很好地打动人、感染人的。

艺术风格的独特性不是艺术风格的单一性。我们常常说某位作家、艺术家的独特风格如何如何，这是就其全部作品风格的总的倾向、总的特色而言的，并不是说他的任何一个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地具有同一的风格特色。布封说过：“一个大作家绝不能有一颗印章，在不同的作品上都盖着同一的印章，这

就暴露出天才的缺乏”^①。由于缺乏艺术才能而产生的艺术上的单调贫乏、千篇一律，与具有卓越的艺术才能的作家、艺术家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的情况，是应该严格区分的。任何一个杰出的作家、艺术家，他一方面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他的风格又总是比较丰富多采、比较多样化的。

艺术风格的多样性、丰富性，与驳杂不纯又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作家、艺术家艺术才能丰富和成熟的标志，后者则是作家、艺术家缺乏才能或艺术上还不够成熟的表现。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品中，就说明这个作品在艺术风格上的不统一，不和谐；这种驳杂不纯表现在一个作家的身上，就说明这个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作品，缺少一种统一的共同风格特点，缺乏一种鲜明的、独特的艺术特色。

作家、艺术家的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人们所普遍认识并借以区别于别的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风格，乃是这个作家、艺术家大部分作品的艺术风格的共同特点，而风格的

^① 《布封文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页。



多样性，則是他的不同作品的艺术風格的各自的特点。它們的关系是，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中，在不同程度上体现着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而这个作家的艺术風格的总的特色，又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在各个作品的独特的風格之中，这样就形成了作家艺术風格的既多样又統一的辯证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們可以看一看李卜克內西对于馬克思的風格的分析。李卜克內西說：

如果布封底話对任何人都是对的，它对馬克思也如此：“風格即其人”——馬克思的風格就是馬克思自己。一个像他那样彻底忠实的人，一个就只知道崇拜真理的人，一个一当被說服某些道理并不正确，不管自己費了多少工夫才得到它們而又多么珍愛它們，便立刻把它們扔开的人，在他底作品中也必然会把他底本色显示出来。不会虛伪，不会假装和忸怩作态，他在著作中和在生活中一样，永远是本来面目。这是实在的，这样一个多方面的、广博的、多才多艺的人，他底風格是不能像資质較為简单狹窄的人那么統一，那么无变化甚至單調的。《資本論》的馬克思、《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馬克思与《福格特先生》的馬克思，乃是三个不同的馬克思，可是在不同中他們还是同一的馬克思——在三位一体中仍然有一种統一——偉大人格的統一，这人格在不同的領域里不同地表现它自己，而又永远还是同一的人格。^①

李卜克內西的这段話說明了馬克思的風格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統一的关系。

我們如果只承认作家、艺术家風格的独特性而不承认他的風格的多样性，容易导致

阻塞艺术个性和艺术才能的充分發揮，是不利于艺术創作的。我們如果只要求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多样性而不注意風格的統一性，不注意努力建立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風格，也会使作品在艺术性上流于瑣碎平庸。無論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利于我們在文艺創作中探索和形成自己的風格。

我国历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不但各具自己独特的艺术風格，而且在不同的作品中又都具有丰富多采的風格特色，前面提到的屈原和司馬迁，就是这样的作家。优秀的文艺批評家刘勰，不仅看到了屈原艺术風格的独特性，而且还看到了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在《文心雕龙·辨騷》篇里說：“騷經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伤情；远游天間，瓊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艳而深华。”* 这里所說的“朗丽”、“綺靡”、“瓊詭”、“耀艳”等等，就具体地指出了屈原不同作品的不同風格。刘勰对屈原作品風格的分析，未必都很恰当，但对我們認識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无疑是有好处的。司馬迁也是一位在風格上丰富多采的作家，他所作的許多人物傳記，几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風格。例如他写《項羽本記》，則雄勇猛健；写《孔子世家》，則典重温雅；写《屈原列傳》，則抑怨恨激；写《刺客列傳》，則激烈慷慨。

* 刘勰多有把不是屈原的作品，誤认为是屈原的。如《九辯》是宋玉的作品，《远游》不知为谁所作，《招隱》則是淮南王刘安的食客所作。

① 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內西：《回忆馬克思》，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8頁。



司馬遷的作品風格，确实是丰富多采的。

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为什么会具有多样性，这是值得我們探討的問題。我认为：第一，杰出的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常常是丰富的，他們的个性和艺术兴趣，常常是多方面的，而且愈是偉大的作家、艺术家，他的艺术才能也一定愈丰富多采。思想、个性和艺术兴趣，是作家、艺术家艺术風格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在他的創作中也就必然会呈現出艺术風格的多样性来。当然，有些作家、艺术家，由于思想和艺术才能不够丰富，因之他的艺术風格没有什么变化；另外，有些作家、艺术家，虽然具有較高的才能，但是由于他的生活或其他条件的限制，因而也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丰富多采的艺术風格。这种情况，自然是存在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第二，作家、艺术家的生活和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总是不断地在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和发展，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艺术風格。例如：南北朝时期的庾信，当他在侍梁昭明太子东宮讲讀的时期，出入禁闕，恩礼甚重，过着极其得意豪奢的生活，这时南朝又正在盛行着宫体詩，他在这种情况下，就写出了風格“綺艳”的作品来；但到他北去以后，故国淪亡了，自己从此开始过着羈旅北国的生活，在这样重大的变化下，他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之，他的艺术風格，也就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所以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絕句》）又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杜甫在这

里称贊的，正是庾信的思想內容和艺术風格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后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由于作家、艺术家思想前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因而作品的風格也有所变化甚而至于有很大变化的情况，是屡見不鮮的。第三，作品的風格，一方面受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审美观点和艺术趣味等的决定性的影响，另方面，又与作品本身的内容有密切的联系。作品的内容，对作品的風格也起着积极的作用。越是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就越是善于使自己的艺术描写手段，适应于描写的对象。这样，他們的艺术風格，也就显得丰富而多采。清代的吳見思曾經說：“史公（指司馬遷——引者）遇一种題，便成一种文字，所以独雄千古。”（《史記論文》）由于司馬遷善于根据不同的題材来进行具体描写，他的艺术風格，也就如姚祖恩所說的达到了“洸洋瑋丽，无奇不备”的程度。

可見，一个作家、艺术家的艺术風格的多样性，不仅是他們在探索自己的独特風格的过程中所需要的，而且也是他們在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風格之后也仍然孜孜不倦地着意追求的；不仅是作家、艺术家本身所追求的，而且是客观要求所决定的。今天，我們的作家、艺术家有的已經形成自己的艺术風格，有的仍在探索；为了更好地反映我們丰富多采的生活，我們需要更多具有風格的独创性和多样性的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前人的經驗中有許多有益的东西，可以供我們吸取，但更重要的是我們的作家、艺术家要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和創作实践进行創造性的工作。

